

第一章 人生起步

家 世

1894 年是中日战争爆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的一年，也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中国面临革命转变的一年。这一年的 12 月 4 日，宋家的第一位男婴在上海同仁医院呱呱坠地。宋氏夫妇给孩子取英文名“保罗”（Paul）中文名“宋子文”（其名字的英文缩写 T. V. Song 为宋子文所常用，也为人们所熟悉），希望他将来能像圣徒保罗一样在中国弘扬基督教的福音，像民主革命先行者孙文（中山）一样在中国传播西方的民主政治与富强之学。

宋子文是宋家的老三，上有霭龄、庆龄两个姐姐，下有美龄、子良、子安三个弟妹。姐弟六人皆是民国时代的著名人物，宋家更以“宋氏三姐妹”而闻名。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宋家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大家族。

宋氏家族的第一人宋嘉树，字耀如，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他出身寒微，却造就了“一代王朝”，培育出了一批在旧中国历史舞台上有过一定影响的著名人物。宋耀如本不姓宋，而姓韩。他的

父亲韩鸿翼，即宋子文的爷爷，是当时广东海南文昌县的一位颇有文化修养的商人，以热心公益而著称。母亲韩王氏，是一位秀外慧中又坚强、贤良的女子。宋耀如颇见功力的书法，对诗词韵仄的熟谙，最早便得益于母亲的教育。

1875 年，在宋耀如 10 岁那年，他带着对大洋彼岸的憧憬，跟随从美国回到家乡招收学徒的舅舅（其实是其婶婶宋氏之弟）赴美国谋生，后成为舅舅的嗣子。这一去即改变了宋耀如一生的命运。1880 年，他在美国南部的维尔明顿市接受洗礼，皈依了基督教，取教名为查理·琼斯·宋。1881 年，进入圣三一学院（后改名杜克大学），1882 年转到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就读，1885 年结束学业，被授予监理会见习牧师称号。1886 年，宋耀如受命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在上海的南卫理公会当牧师。为筹措经费，他在传教之余，“重操旧业”，进行了经商活动。1892 年，宋耀如辞去教会职务，投身实业界，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富有的资本家。1894 年，他与孙中山结识。对清廷专制统治的不满，对西方民主与富强之学的崇尚，使二人很快成了密友。宋耀如是国内最早聆听孙中山宣传革命道理的人之一，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热情支持者。宋耀如曾多次冒着砍头的风险，以印刷中文圣经为掩护，秘密印刷反清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宣传品。为了支持革命，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倾囊而出。

宋耀如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奉献，及其造就“一代王朝”的成就皆离不开他那情投意合的贤内助的支持。就在宋耀如归国不久，在他热心而艰难地为传教奔波之时，爱神已悄悄地降临到了他的身边。经朋友的安排，宋耀如结识了上海富商倪韞山的二女儿倪桂珍。倪桂珍是一位端庄、贤淑、有知识、有主见的姑娘。她的母亲姓徐，是明末大学士、《农政全书》的编著者徐光启的后代，

上海徐家汇就是因徐家住在此地而得名。受父母的影响，倪桂珍自小便接受洗礼，成为一名新教徒。17岁毕业于西门培文女子学堂。她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曾在裨文女校任教员。1887年，宋耀如与倪桂珍冲破种种阻挠，由相知相爱而结为夫妻。宋耀如曾这样评价他的爱妻：“桂珍是生活在东方的坚强女性，她的伟大在于敢自己选择爱人，这在东方、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

作为家长，宋耀如夫妇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在宋耀如的心中有一个宏大的心愿，即努力将子女培养成中国的林肯、华盛顿式的伟大人物。他常对人说：

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①

为了这个理想，宋氏夫妇制订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全新的教育模式。在充分施展孩子们的美好天性的同时，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各方面的训练。对孩子们的管教，他们是慈中有严，严中带着爱与希望。

首先，自孩子咿呀学语起，宋耀如夫妇便对他们进行中、英文的双重训练。宋耀如常对孩子们说，学英文是为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留学海外长知识学本领，再来报效祖国，所以中文一定要更好。他坚信未来中国的领袖一定要学贯中西。在父母的教导下，宋子文在入学前便学习过古文和进行过中文写作技能训练，还认真练习了毛笔字。习写毛笔字，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内容，也是锻炼人的耐性与毅力的一种好方法。为帮助孩子们学英

于醒民等：《宋氏家族第一人》，北方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63—364页。

语，宋耀如从美国购来了大量幼儿读物，夫妇俩轮流教孩子们读写。宋耀如还常用中、英文两种语言给他们讲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适时并深入浅出地向他们传输了科学道理与民主、革命思想。为鼓励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与自信心，宋耀如把客厅里原本挂装饰画的一面墙壁当作孩子们展览作品的场所，那上面有绘画，有习写的毛笔字，有用中、英文写的文章。每当有熟悉的客人来访时，这些文章或字画的作者就会被请出来与读者见面，有时也需说明一下自己的构思。这时，身为父亲兼总设计师的宋耀如就会快乐地坐在一边，欣慰地注视着他的儿女。

除了传授知识，培养学习兴趣外，宋氏夫妇还十分重视孩子们各种技能及意志的锻炼。宋耀如坚信，要成为一个伟大人物，必须有钢铁般坚强的意志。为此，他以各种方式，诸如野外远足、忍饥挨饿等来训练他年幼的儿女，让宋子文每天步行上学也是其中的一例。在技能训练方面，宋耀如同样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如办报、举办家庭演讲会等等。1898年，宋耀如和他的长女宋霭龄一起编了一份《上海儿童报》。这是一份英文打字小报，主要文章都由孩子们自己写作，渐渐地，打字的任务也从父亲转由孩子们自己完成。这份独特的家庭小报一直办到宋子文的两个弟弟宋子良、宋子安进入中学才停刊。在这种创造性的自立活动中，宋子文和他的姐弟们不仅提高了英文写作技能，也增长了其他才干。在大女儿上了一年学、已能做讲演练习时，宋耀如便不时地召开小型讲演会，在大姐霭龄的影响下，弟妹们先后开始学习讲演。宋子文的演讲口才即由此锻炼出来。还在读中学时，宋子文已显露了他的这一才能。当时的宋子文在学校属年龄较小的学生，平时讲话又有点口吃，但演讲起来却是自然流畅，而且能用中、英文两种语言讲演，着实令老师们惊叹。

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孩子们的知识自然是迅速增长，但宋

耀如并不满足。他认为教育应当是社会的、全方位的，不管家庭教育多好，也不能取代正规的学校教育，更无法代替集体生活的训练。而且，孩子们长大了总要走入社会，独立地面对社会，他（她）们不应当是笼中的金丝鸟，而应当是时代的弄潮儿。为此，还在长女 5 岁时，宋耀如就执意将她送到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住宿求学。他的其他 5 个儿女也先后入教会学校读书。教会学校虽以传播宗教信仰为主旨，但同时也讲授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其课程设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哲学、体育等，兼顾德、智、体三育教育。

宋子文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他在该校度过了从少年班到大学班的求学生涯。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在旧中国开办的大学，其前身是 1879 年创立的圣约翰书院。1890 年开始设大学课程。1905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区以圣约翰大学的名义注册立案。宋子文在校时学习非常认真，或许承继了母亲的特长，在各科中，他的数学成绩特别好，他更有一套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忆数字的巧妙本领。在宋子文的前后校友中，出了不少民国政界、外交界、金融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如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俞鸿钧、严家淦、陈光甫、刘鸿生等。该校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宋子文也一直深以该校的毕业生为荣。

在让孩子们接受西式教育的同时，宋耀如更重视培养他（她）们的爱国情感。他曾告诉孩子们说：

美国有发达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这是事实。可是美国的繁荣也有中国人的一份功劳。十几年前，在美国的华工就有三四十万。他们为开发美国西部付出的血汗，连美

国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①

在当时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国内维新运动、革命运动先后蓬勃开展之际，宋耀如更是常常以孙中山所宣扬的民主与革命思想来教导孩子们：

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面，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②

这是孙中山的一篇名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的一段，也是宋耀如常常领孩子们朗读的一段文字。

宋耀如不仅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文字教育，他还有意识地带领他们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政治集会，希望孩子们在实践中受到更深切的爱国主义的熏陶。1904年4月30日，上海市民在张园举行拒俄大会，抗议沙俄霸占中国东北，声援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这一天，宋耀如带着霭龄、庆龄、子文、美龄4个孩子一起去参加了大会。年仅10岁的宋子文和他的3个姐妹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宏大的场面。目睹国人如火如荼的爱国热情，他们那幼小易感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特别是蔡元培在会场上宣读了东京留日学生要求组织义勇军奔赴战场的电报后，会场上热烈、激动的情绪更极大地感染了孩子们。这一次活动，无疑给宋子文姐弟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② 《宋氏家族第一人》第437、442页。

第二年，他（她）们便以实际行动投入了全国性的抗议运动行列。1905年，由于美国政府迫害华工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反美爱国运动。宋耀如虽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一向把美国看成理想国的楷模，但他对祖国的爱是忠诚的，他也了解并痛恨美国政府野蛮残酷的种族歧视政策。当这种种族偏见使在美华人深受迫害与侮辱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全国性的反美运动。宋子文兄弟也积极地投入了反美行列。他们跟着父亲一起上街散发传单，搞宣传，并以实际行动抵制美货。在上海的广东人中，宋耀如是以做美国生意出了名的。抵制美货，无疑会使他的利益受到损失，但为了反对美国的暴行，为了在美侨胞的利益和尊严，宋耀如坚决地采取了抵制美货行动。在父亲的影响下，宋子文和他的姐妹不仅毫不吝惜地把心爱的美国玩具、文具等丢进了废物箱，而且还在他们的住地虹口挨家挨户地劝大家抵制美货，他们甚至还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童子抵制美约会”。

在上述种种理性与感性知识的熏陶，以及实践活动的锻炼下，宋子文那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根。他曾坚持民族主义立场，与列强的大国主义进行过抵制和斗争。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坚决反对外敌的侵略扩张，反对国民党内部的妥协投降主义，为争取外援、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殚精竭虑。当然，他的民族主义立场也是有特定限制的，是受他的政治立场束缚的。

据外国专家评论，在宋氏兄弟姐妹中，宋子文是受过宋耀如特殊熏陶的唯一男孩，不但能吃苦耐劳、专心致志、坚韧不拔、富有进取精神，而且性情活泼，不乏幽默诙谐。严格的家教，培养了宋子文诸种良好的品性，这在他日后所从事的经济、外交等活动中皆有所表现。这些品性也是宋子文一度成为民国时期权倾一时之风云人物的某种不可或缺的条件。

赴 美 留 学

1912 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庄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时年 18 岁的宋子文和他的家人一起参加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就职典礼。同年，宋子文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前往美国留学。留美期间，他依然非常用心地念书，并常参加社交活动。

宋子文先在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哈佛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宋子文当时的兴趣和志向虽在经济而不在政治方面，但心中涌动的那股爱国热情，使他同其他留学生一样，一度十分关心这场战争与中国的关系。他曾在《留美学生月刊》（*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上发表文章《欧洲战争和中国的对外关系》。当时的宋子文根本不会想到，在 20 多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会以中国外交部长的身份驻在美国，折冲于各大国之间。

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宋子文还成了妹妹宋美龄的保护神和监护入。1913 年宋庆龄从卫斯理女子学院毕业回国后，宋美龄便从该校转学到波士顿附近的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斯利学院，好和在哈佛上三年级的哥哥宋子文离得近一些。在美国，兄妹俩的关系很密切，宋子文经常去看望他的妹妹。作为兄长，他说话总希望妹妹照办。宋美龄则很听身边这位唯一的亲人兄长的话，与人交谈“经常提到子文”。据威尔斯利学院一位与宋美龄较熟的教师说：“美龄是个家族观念相当重的人，总是为家族感到骄傲。只要无关大局，她总能顺从家族的意志。”兄妹二人回国后，这种深切的兄妹之情便渐渐淡化。尤其当宋美龄成为蒋夫人，宋子文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之一员后，兄妹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手足之情，更多的是政治利害关系了。

1915年宋子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这时，他没有急着回国，而是前往纽约，一边实践，一边继续深造。他在纽约的国际银行当了一名职员，其主要工作是协助办理向中国汇款事项。通过这项工作，宋子文看到了海外华侨是如何小心谨慎地向国内家属汇款和投资企业，这为他了解国际金融业务、了解海外华侨的理财之道，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见习机会。晚上，宋子文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仍主修经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边学习边实践，使宋子文既增长了理论知识，又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1917年，宋子文毕业回国。

5年的留学生涯，对宋子文日后的事业与生活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他的英语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他那流利、扎实的英语是他以非外交界人士而执掌中国外交大权达5年之久的一个有利条件。其次，5年的求学，使他系统学习了西方的经济理论，并养成了照规章制度行事的习惯。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在中国付诸实践，这是宋子文在旧中国一直追求并努力推行的目标，也是他步入政坛、进而跃升为国民政府之要员的一个有力因素。照章办事的习惯，是任何从事经济工作者所不可或缺的，但在宋子文的政治生涯中，这一习惯却成了他常与蒋介石发生矛盾冲突，以致政治生涯曲折起伏的一个不利因素。第三，在5年的留美生活中，宋子文结交了不少美国朋友。他那活泼的性格及老天赋予的幽默感，使他较容易与别人相处。作为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宋子文深以为荣，这也大大提高了他在别人眼中的地位，因为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创立较早、影响极大的两所大学，许多美国伟人、名人、政界要人皆出自哈佛或哥伦比亚大学。通过朋友的关系或以校友的名义，广泛结交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美国政府中的决策人士，这是宋子文在外交部长任内开展工作所常用的一种手腕。第四，多年的西方文化的熏陶，使宋子

文养成了独立、率直、开明、务实的个性。这种个性，使他没有成为那种人云亦云、唯唯诺诺的宵小之徒，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一度有所作为，并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他的独立与率直，为喜好独裁的蒋介石所不容，于是有了他政治命运的起伏跌宕。第五，在美国 5 年的学习与生活，使宋子文对东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近代西方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回国步入政坛后，他努力将他的思想认识付诸实践。他曾强烈要求革除积弊，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并为废除外国在华特权、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而努力。这一些无疑是他政治生涯中值得肯定的部分。不过，他心灵深处的那种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也是在留美期间种下的根。

初 入 社 会

1917 年，宋子文学成归国后，经其父宋耀如介绍，应聘到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任秘书。汉冶萍公司是一个经营煤矿、铁矿和钢铁厂的工业联合体，由清末著名官僚、实业家盛宣怀创办，当时的总经理为盛宣怀之子盛泽丞。

宋子文上任伊始就把公司账目和财务料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总经理盛泽丞赏识，加之宋子文英语流利，盛泽丞便邀请宋子文作其妹妹盛谨如（盛宣怀之女，盛家的七小姐）的英语教师。宋子文的能干、博学以及他的幽默诙谐很快赢得了正值豆蔻年华的盛谨如的芳心，七小姐的美貌多姿则使年轻的宋子文为之倾倒，爱情的种子在两人心中悄悄生根、发芽。正当这对恋人沉浸于甜蜜的爱情、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之时，他们的恋爱遭到了盛家的阻挠，盛家断然反对这门亲事，理由是“门不当户不对”。按理说，宋家各方面的条件均不错，民国成立也有 5 年之久，但恋爱自由、婚

姻自由在当时的中国仍属稀罕之事，思想陈旧保守、自视甚高的盛家更是死抱封建门户观念，活活拆散了这对鸳鸯。宋子文被调离上海，转至汉阳公司会计处任科长。

情场失意的宋子文一气之下，离开汉冶萍，到联华商业银行供职。以后，他又相继到大洲实业公司、神州信托公司等处任职。在回国后的最初几年中，宋子文与二姐宋庆龄、二姐夫孙中山有一些接触，但还没有卷入政治，只是专心致志地从事经济活动，浪迹于实业界、金融界。这期间，他虽无大的发展，却多少有了一些了解中国经济情况及从事经济活动的直接体验，这对离国多年的宋子文来说，是很有帮助和启发的。多年的实践，使宋子文有了重新适应阔别多年的环境、进一步了解国情的机会，这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只是在这几年里，他的事业与爱情皆多坎坷，使他颇不得志。更令他伤痛的是，在他回国后的第二年即 1918 年，父亲宋耀如因病去世。

回国后的最初几年内，除了从事经济活动，宋子文也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主要是一些团体性的活动。他加入了由顾维钧发起组织的中国留美大学毕业生组织——兰集兄弟会（Flit Flat Fraternity）。每月参加交谊会 1 次，每年参加例会 4 次。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组织，该会“入会资格极严，凡留美大学，得有学位，品行端正，而能交际，经会员介绍，方得为该会会员”。宋子文是 20 年代初兰集兄弟会在上海的 30 余名会员之一，他与该会的发起人顾维钧关系颇佳。顾维钧是一位职业外交家，在日后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期间，顾维钧常提供建议给宋子文，宋子文信任他，并很愿意与他共同分析时局，商讨对策。

此外，宋子文还不时参加圣约翰大学校友会的活动。宋子文一直以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为荣，对母校感情甚笃。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他曾在该校校刊《圣约翰的呼声》上发表文

章，作为当时中国之经济首长，宋子文无疑为母校增了光。宋子文还曾多方努力，使盛宣怀生前藏书 66000 多册捐赠给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

宋子文在旧中国历史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是在 1923 年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之后。

第二章 事业的启程

步入政坛

1923 年 3 月，宋子文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参加了广东革命政权的建设。这是宋子文政治生涯的开始，也是他日后大显身手的发端。

1923 年 2 月陈炯明叛军被赶出广州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府，并出任大元帅。至此，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新生的革命政权急需各方面人才，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最为急迫的便是财政问题。这时，宋庆龄把宋子文引荐给了孙中山。宋庆龄相信，她的这个弟弟有能力帮助解决革命政府的财政问题。

就宋子文来讲，投奔孙中山，是他当时最理想的选择。首先，自小受到的民主思想的教育，使他厌恶专制的军阀统治，5 年的留美生活，更使他向往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与宋子文追求的那种民主模式有着大同小异之处，这是宋子文投奔孙中山并追随孙中山的一个主要原因。其次，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其政权正待发展壮大，孙中山急需各方人才以开展工

作，留学多年、正图一展抱负的宋子文既是孙中山所需之人才，革命政权所在地——广州，也为宋子文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

宋子文一到广州即投入了工作，并很快显露了他的才干，令孙中山十分赏识，不断地委他以重任。宋子文则不负所望，不仅使广东革命政权渐渐摆脱了财政困境，而且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

宋子文初到广州时被委任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1923年4月，孙中山开始筹建由革命政权直接掌握的中央银行，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筹备员，以发挥他在经济方面的才干。同年5月，宋子文被任命为筹备中的中央银行副行长，以具体负责中央银行的筹建工作。

在宋子文筹建中央银行之初，广东的金融界是相当紊乱的。在币制方面，当时是外币充斥市场。自民国成立至北伐统一期间（1912—1928年），为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全盛时期，外国银行纸币发行额亦正达鼎盛时期。在广东，以英商汇丰等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最多。中国货币则形形色色，极不统一。有广东银行发行的纸币和“东毫”银币，有各钱庄发行的银票等。普遍使用的毫银又有新旧、轻重之分。各种货币比值不一，比价时起时落。在金融机构方面，有外国银行、华商银行，还有几百家银铺，银铺大多从事买空卖空、投机倒把之活动。官办银行——广东省银行，因实际资本不多，加之受政治风潮波动的直接冲击，信用低下。上述情形的存在，严重妨碍了新生革命政权的财政收支和金融稳定，也影响到革命政权的巩固与发展。

宋子文接手后，主持拟订了中央银行的条例、章程和组织规程等一系列文件，并报孙中山审核。中央银行条例规定，该行的业务范围为：“1. 买卖国库证券、商务确实期票及汇票或贴现；2.

办理汇兑及发行期票、支票、汇票；3. 买卖生金、生银及各种货币；4. 经收各种存款，并代人保管证券、票据契约，及其他贵重物件；5. 贷放定期或活期有确定担保或抵押品之借款；6. 买卖经政府担保之有息债票、证券，及本国铁路、公司、商场、工厂等之优先股票；7. 其他关于银行应经营之业务。”条例另规定中央银行享有革命政府授予的下列特权：代政府募集内外实业债款，发行货币，代理金库现金之出纳及代收各种公款，代政府创办或经营各项国有之实业。条例还规定：政府不得向中央银行任意支借现款，如贷款与政府，应以有确实抵押品或担保而用诸生利事业者为限，其款额不得超过资本总额 20%，偿还期不得逾 6 个月。在中央银行的组织规程中，对中央银行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作了必要的规定。中央银行章程则对中央银行的业务、职权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上述文件的拟订，表明宋子文不仅要使中央银行担负起一般金融机构所执行的财政、经济职能，而且一开始就有将中央银行建为金融中枢机构的设想，并试图将近代西方货币银行学说和有关制度引入中国。在吸取银行经营中的某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特别对政府金融机构与其同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某些规定。宋子文认为，即使是政府自己一手创办的政府银行，作为政府也须遵循金融领域自身的运作规律，而不能使银行成为行政当局随意支取之库。这是宋子文在以后相当长时期里力图贯彻实施却始终未能如愿的主张，也是他与蒋介石关系紧张的一个主要因素。

孙中山自提出筹建由革命政权自己掌握的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后，一直十分关注该行的筹备工作。对于宋子文拟定的各项文件，孙中山是逐条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经由大本营政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公布施行。在孙中山的支持下，经过 1 年多周密的筹备，中央银行于 1924 年 8 月宣布成立，宋子文出任行长。

孙中山在中央银行开幕式上发表训词，对该行寄予了厚望。孙中山对宋子文的器重、对中央银行的支持，为宋子文发展中央银行的业务，也为宋子文本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

中央银行是成立了，但在外商银行垄断金融的状况下，要巩固它并使其尽快发挥支持革命的作用，实非易事。为加强中央银行的地位，提高和巩固中央银行纸币的信用，宋子文着重从两方面采取了措施：

一方面，宋子文运用政权力量确立了中央银行纸币在流通、支付场合的特殊地位。宋子文曾呈文孙中山，提出如下建议：

职行定期发行货币，应请通令各征收机关及商民，交易一律通用；

所有公私款项出纳，自应一律通用。在公家征收机关，尤应专收职行货币，以示提倡。事关提倡职行货币信用，应请钧座明令各征收机关，所有征收田赋、厘捐、租税及其他公款，均一律收受职行货币。其报解公款者，非职行货币，概不收受。至商民交易，应准其照额通用，视与现金相等。^①

宋子文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与采纳。根据孙中山的训令，广东省长公署迅速颁令各县各机关遵行。为利于中央银行纸币的流通，中央银行又设立了几个兑换发行处，并委托几家信誉较好的银号代理兑换业务。1925年2月颁布《取缔外币条例》规定：

所有市面直接交易，概以国币为限，不得行用外币；

凡人民向征收机关缴纳田赋厘税饷捐及其他公款，均须一律缴纳国币。

7 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又颁令对以低价收买或拒绝使用中央银行纸币者，“即行查拿严办”。上述各项规定的实施，不仅确立了中央银行纸币在广东革命政府所辖区域内的地位，而且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对发展根据地经济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面，宋子文通过加强货币发行的准备，提高中央银行纸币的信用。1925 年 9 月挤兑风潮的平息，正是宋子文重视十足准备的一个成功案例。这一年 8 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为搜捕嫌疑犯，广州实行了戒严。政局的不安很快波及到金融，9 月初中央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对此，宋子文立即采取措施，不仅决定照兑，而且每日延长营业时间 2 小时，以满足商民的兑现需求。两天之内，中央银行兑出毫银 40 余万元，挤兑风潮随之平息，这既显示了中央银行纸币有着充足的准备，也因此提高了中央银行及央行纸币的信用。事后，宋子文曾表示：“货币流通，全恃信用，鄙人初无点金之术，所恃者唯平日所积储之十足准备金而已。”

在宋子文的直接领导下，中央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实力逐渐增强。至 1926 年 8 月 1 日，宋子文宣布对“流行市面为数甚巨，且价格坠落，几等于零”的广东中国银行钞券按面额三折收回，并称还将对信用破灭的省立银行钞券进行清理，这表明中央银行的实力已达到能对广东金融进行维持和调剂。随着中央银行实力的加强，和国民革命事业的迅速发展，广东革命政权越来越多地仰赖中央银行，而不再受制于其他金融机构。据统计，至 1927 年初，

《银行周报》9 卷 9 号（1925 年 3 月 17 日）。